

重点阅读



冯骥才的《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是一本读后让人觉得异常沉重的书。我们看到,就文化传承而言,在日本、不丹、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许多富有地方特色、融合了民族和宗教特征的文化都得到了很好保护,不仅因此传延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让其文化特质得以保留,而且还成为这些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行业发展的依托。但在我国,民俗文化传播却困难重重。多年来,在政治运动、城市化等多股浪潮的侵袭下,民俗文化几乎陷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许多地方的领导和官员,往

■新知新思

被人们称为“汉语四六级考试”的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水平测试,于2011年年底在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和天津等试点地区开考,并将从今年起推广到全国范围。用考试的方式,能否改变当下社会的汉语应用现状?据报道,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770位受访者中,58.2%的人关注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水平测试。仅26.2%的人认为用汉语能力测试的方式能改善汉语应用现状,42.1%的人认为不能,31.7%的人表示“不好说”。受访者中“70后”占29.4%，“80后”占42.6%，“90后”占10.9%。

时下,中国人都不自信了,对于用汉语表达没有了信心,怀疑中国语言的表达能力是否在下降。尽管对此众说纷纭,但是汉语水平高的人、尤其是精通汉语或者能读懂经典文学的人不多却是事实,对中国语言的理解也仅仅是从表面或者停留在低级层次。即便是通过考级的方式使中国汉语的表达能力得以改观,我感到也相当困难。

其实,中国的汉语能力或者说语言表达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没有赢得主动。从孩子的启蒙教育到之后的学习教育都有些功利化,而且目前的教育现状更是使语



读书与旅游

■谈建国

读书如登山临水、游历四海,妙处往往在“山色有无中”寻得。初读一本名著,往往是见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再读则此山已非彼山,此水亦非彼水。山于是成了心中的山,水于是成了心中的水。三读则是成了那山,水还是那水。如是,则书之韵味已融会于心灵。

读书亦如游园探幽,在“初日照高林”的爽利心境下读书,渐渐入曲径,直通深幽之处,继而闻萧萧竹叶声,而至腋下习习生凉。正妙不可言之际,忽然天色灰暗,风景黯淡,日月无光。于是重理头绪,凝神探寻,直至柳暗花明,新境又出。

读长篇如爬山,费在心恒,若坚持不下来,就

还有多少次“临终抢救”

□郑渝川

住在完成对旧有民俗、文化遗址的“改造”后才恍如大梦初醒,一下子发现了文化的商业价值、开发效益和政绩价值,于是,要么开始建造拙劣的仿古建筑,以山寨版本告诉人们某地某城“曾经阔过”;要么就开出巨额补贴,表现出对创意文化人才、项目和产业渴求的姿态。

譬如江苏南京。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多年来,南京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将历朝历代建造的许多古街巷和民居拆除。2006年,在名为“建设新城南”的城市改造中,南京将老城南京仅剩的明清街区遗存,包括黑簪巷、颜料坊、牛市、洋珠巷、铜作坊等历史街巷拆除一空。此事曾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南京的毁灭式拆旧改造停了下来,然而,城里仅剩的大半个明城墙外壳和极少几条老街,怎堪人们凭吊六朝古都的情怀?

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在湖北襄樊(2011年改名为襄阳)。2007年4月,“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在襄樊举办。主办方认为,刘备的三顾茅庐以及诸葛亮的《隆中对》,都是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使襄樊成为三国文化的源头。当年7月1日,襄樊又举办了“国际关公文化研讨会”,许多与会者参观了传承千年、纪念盛产的襄樊古刹“汉圣庵”,并讨论如何保护修缮这座文物建筑。但仅在几日之后的7月6日,“汉圣庵”就遭遇强拆。多名拆迁人员以“偷袭”的形式进入“汉圣庵”,将守护人员捆绑后,强行用推土机推毁了庙内建筑。

正是出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冯骥才以赛跑的姿态,奔走于中国大地各处,抢救、记录、发掘着各地民间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理说,冯骥才应是那些自称很懂文化、很重视文化的各地官员们的座上宾,

他们理应热情地欢迎他,积极响应他的号召,保住本地的文化血脉。但是,冯骥才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支持,就在他奔走抢救的过程中,各地的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等成果,却在更快地被拆除和毁灭。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一个靠土地财政及土地项目运作获得利益的体制下,只要拆迁并改作其他用途的新建比保护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的效益高,地方政府的选择就几乎毫无悬念。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就显得更加具有典型意义。书中记录的虽然只是冯骥才运用多年来的文化抢救经验,通过“视觉人类学”与“口述史”等方法,对天津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拆迁前“临终抢救”的具体过程,但却让人真切地感到了保护和抢救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有“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传统。过去,杨柳青镇曾分布有多家全国知名的年画大厂,集中了大量雕版和手艺高超的画师。由于紧靠京津,受城市文化影响,杨柳青年画的审美倾向于市井文化。而在南乡三十六村,“境内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而过,地下水丰富,宜种小麦、玉米,养鱼植果;这里盛产小麦,又多芦苇。枣木可以雕版,蒲草是造纸的天然材料,都是年画滋生的上好条件”。其中的妙米店村,这个只有140户人家的小村子,年画店曾多达百家。南乡三十六村甚至形成了合作加工制作的产业链,“一些村里还有画铺和作坊,以印画为主,作坊里一般只印线版,余皆交给三十六村的农民填色描花,施粉开脸”。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外敌入侵占领和政治运动之后,南乡三十六村的画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冯骥才前几年去发掘时,只

找到4位木版年画的艺人。村中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就是大冯笔下的主角。

如果,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分布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些重视民俗文化的国家,或者分布在近年来本土文化保护培育意识高涨的中国香港等地,相信那里的木版年画及相关艺人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设法创造条件让其传承延续,绝不可能采取武断强拆整个村子的做法。但南乡三十六村偏偏就遭到了全面拆除的命运,冯骥才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仅只是帮助4位木版年画艺人中的王学勤一人,将其画室的一部分搬到龙门乡艺术博物馆。《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附有本次抢救过程中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也可以说,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留给世人的回忆除了王学勤那个搬走的残缺画室,也就剩下了这本书里百余幅“临终抢救”照片。

书中记录道,“这男子(南乡三十六村一位村民)对我含泪说,‘我们不就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冯骥才只能感慨说,“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将失去记忆、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遗产,它们怎么办?”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也是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没有了文化传承,我们怎么办?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冯骥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出版)

汉语表达能力,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白东河



生学习写字和读书起,都是追求能否考上最好的学校、考上研究生,而非追求能否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或者说在表达中能否应用自如。正因如此,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写不了一份总结,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公文,或者让其办事,结果由于理解有偏差,事情办得一塌糊涂。

二是平时的语言教学没有注重语言的表达能力或者说应用能力。相反,现在的教育更注重学生能否把一张试卷答个满分或把课本学个精通,反对孩子进行丰富的阅读,或者进行深层次的课外阅读,进行学生演讲会之类的,也仅仅是应景之作,应付一些活动而已,况且拉出来的学生也是出类拔萃,或者说百里挑一,而非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去演讲。如此环境,如何能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是家庭里或者社会上,不是看孩子能否说好话、会说话,而是看孩子听话不听话、学习成绩怎么样。如果孩子听话,成天钻进书里,学习成绩好,就根本不管孩子会不会说话,结果那些会说话者进不了高等学府,而成天钻入书本、生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差者往往却考进了

好学校。这样的社会观念和人才选择,更是给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绊子。

从小到大,语言表达都没有引起重视。对于语文课的学习仅仅是抱着应试或者功利性的目的,怎么能熟练地表达中国汉语或者写得一手好字呢?在调查中,有83.6%的人认为现在人们的汉语应用水平下降,其中45%的人表示“下降很多”,这应该是对中国人使用汉语的讽刺,也是给了输在起跑线上的语文教学一记耳光。我们应该清醒了,绝不能让语文教学和语言表达输在起跑线上。



生命邪火与终极关切

□施战军



看简明《佛痒痒》初稿的时候,被这书密集的力量感吓了一跳,后来听说是白描先生推荐的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就觉得挺自然了,因为陕西作家有这样的特点不足为奇。一说到长篇小说,我们很自然就会提到陕西,自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一直和陕西同构,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一直到今天的红柯,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地缘学表征之一。

读完《佛痒痒》的时候,发现它又很不一样。这本小说给人的是非故事性的阅读感受,描写生活的非逻辑状态。它与我们所认为的中国长篇小说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佛痒痒》描述的是人在生存的挤压之下所爆发出来的邪性与传奇的力量,中国人都遭受过这种生存的挤压。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现在,这种力量不光在出生的故事里能感受到,在野鸡胡的故事里也一样。野鸡胡监狱是一个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凝练为一个象形符号——“囚”。这不仅仅是监狱里的人的命运,也是所有人的情境。

在非逻辑的情况下小说放得很开,作者将自己解放了出来。同样是写个人成长,与路遥不同的是,路遥的个人成长是激励着青少年向上攀爬;而《佛痒痒》则是反观成长,从儿时到成长,向着极端绝尘而去。小说里对生活的审视也是两级的,盼望安稳,但写的全是动荡,是一种向着生存与注定的道道障碍不断磕碰的命运结构。这种写法之下,但凡遇到了生活的沟沟坎坎的时候,小说的文字都笔力非凡。小说里最大的困顿和挤压体现在人的肉身,这个时候简明的语言显得才华横溢。比如他描写侯江潮的未婚妻,“她走路的时候,夹着双腿,裆部、大腿内侧发出‘喀喀’的声音。她的眼神不怎么挪移,或者说直勾勾地硬生地甚为坚定,当她把目光移向侧方,让人觉得仿佛后面拖着一个重物,似乎她要把原先先注视的物体连根拔起,带着沉沉的力度。这种目光后来常常被梅昊提起。他说,这个女人的目光像连在绳子上的甩钩,甩出去,拉回来,都要捎带些皮肉。毒啊!要不怎么勾去了六个男人的性命。”这样的语言太刚猛也太真切了,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是力大无比。像这样的地方小说里很多。由于《佛痒痒》的非逻辑性,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块块碎金的闪耀连缀。写到野鸡胡的屎尿池那里,确实有种邪性的力量,那是全篇力道体现得最完足的一个地方。简明写人身体的感觉,“我的身体沉重得好像捆着一头驴”,匪夷所思但是又合情合理。这也体现出陕西的地方性,让一位江南的作家写,是不会有这样的句子的。即便是山东作家也不会把身体和驴绑在一起,这是西北作家特有的想象力。小说里有很多个人文学风格的描绘方式,写人的身体状况异常,他常用“黑色的嘴唇”、“紫色的嘴唇”;描绘男人,他用“胸膛向外腾腾冒着热气”这种方式。

李建军谈论这本书时作了联想,世界上不少经典文学作品都和监狱、犯人有关,他提到了《死屋手记》《第一圈》。还可以有王尔德的《狱中记》,甚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劳改生活、囚犯生活和日常社会秩序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是秩序的反叛之路和重新规训之旅。我们生活在秩序中,但又要挣脱秩序,有时不得已向秩序叫板。不得不恨、不得不冷酷,但又不能不爱、不能不怀忧,这就是《佛痒痒》展现出来的矛盾。这是个无法回避的情境,我们活着的情境充满了囚困,挣脱的渴望也就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一代代人的命运。每当必须平复内心狂野冲突的时候,踮上来的很可能就是生命的邪火,《佛痒痒》就是邪火燃烧的过程:上篇是点燃,中篇是烧红,下篇便是成灰。合上书页,回头细想,另外那层超拔而深切的意会可能就泛上心头:人活一辈子,折腾与被折腾何尝不是常态,到终了之时,每个个体的生命也只是那佛前的一柱香。

作品里碎金缀连般的思考,还是归于终极性的问题:我从何而来,我来后怎样,我将归于何处?小说里专门有一个章节叫“然后呢”,他不断地追问“然后”,貌似用调侃的方式稀释了这个念想,而实际上,文本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对以“然后”为口实的终极关切的激情。

(《佛痒痒》,简明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沉的纸箱子,原来全是他的书!

我再次走进朋友的房间,被吓了一跳。本就拥挤的房子里,他居然又放进了一个大书架,琳琅满目的书在上面摆得整整齐齐。阳台也被他精心布置了一番,放了一把躺椅。躺椅扶手上,一本《可爱的中国》已翻到中间,一支笔放在上面,金属笔套在阳光下折射出一种七彩的光辉,五彩斑斓地映在墙壁上。

“这样的环境,你还能看书吗?”我端着一杯咖啡小啜了一口,疑惑地问。

“能啊!毛主席在大马路上都能照样看书,况且我这儿离着大马路还有两米的距离呢。”朋友笑着调侃。随后,他跟我谈起了这些天来读过的书,《外国文学作品选》《安徒生童话》《文化苦旅》《果壳中的宇宙》等,天文地理、儿童文学无所不包。

朋友还跟我说:“这已是我第三次阅读《可爱的中国》了。每一次走近方志敏,我对他的崇敬和热爱就会多一分。每每人生失意的时候,我都会很命地读书,将自己完全融入书里。因为有书的陪伴,我觉得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件好事。我很幸福,对于自己的现状,真的很满意!人生有书不失落啊!”

朋友说,书能带给人沉静感受,闻着书香,再烦恼的事也会灰飞烟灭。这话我是相信的。其实我知道,朋友这辈子应当说很不幸,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后就没再管过他。他高中毕业后就出来工作,可工作也不顺。这两年他在一家模具厂上班,没料到又不慎被轧断了一根手指。尽管

如此,流水线上的辛苦生活依然没有改变朋友读书的习惯,他依然开朗、乐观、积极,对生活充满热情。他的人生或许很失落,是我们眼中的失败者。但因为有了书的陪伴,他的日子依旧活色生香。

看着朋友脸上那自得的笑容,闻着他那满屋的书香,喝着手中温热的咖啡,听着耳边嘈杂的车声,坐在阳光里,翻一翻《可爱的中国》,我的心也幸福满溢。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人生有书就不失意。捧一本书在手,放下哀怨,惟放快乐在心头,这辈子,用书香滋润人生,是最幸福开怀的事!

诗歌里的乡思

■尹鹏志

每逢阖家团聚的春节,都会让故乡悄然走进游子的心房。儿时读李白的《静夜思》时,故乡是一缕冰凉的乡愁。长大了些,渐渐明白了一些人和事,方始知道,其中除了悠长的思念,还有无奈、隐忍和浓郁的化不开的乡愁。

生命都有根,每个人的生命之根都曾经扎于故乡的沃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言清新朴素,明白如话。简单的几个字,鲜明地勾勒出一幅月夜思乡图。和李白的浪漫飘逸相比,杜甫的诗显得凝重和苍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字里行间既有对离乱、战争之思,忧国忧民,也有对故乡和亲人的

怀念和遥想。哪里明月不照人,何必单挑明故乡的月亮最明?这是诗人的心境使然,更是乡情使然。

故乡有美味小吃,故乡也有那说不尽、听不够的乡音。苏东坡在登州逗留20余日,留下了一首《鳊鱼行》:“膳夫善治荐华堂,坐令雕俎生辉光,肉炙石耳不足数,腊鱼鱼皮真倚墙”。鲑鱼的珍贵使硬板都增光生色,鲁菜之美跃然纸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近乡情更怯的心情刺激着诗人,千愁万恨、万般思绪涌上心头。诗人把这万千愁思化为了两句千古绝唱:“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生如戏,他将谢幕留在了生命的起点——故乡。

诗意使诗人的生命光芒四射,诗歌也常常表现出作者的思乡怀亲之情。“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在仕途无望时,诗人初始的淳朴的乡恋就弥漫了他的心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江岸的丹枫和江中的渔火惹起了诗人的乡愁,久久不能成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思乡怀亲之情。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以及“落叶归根”的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凝聚力的体现。

走进诗歌,我们发现故乡还是那个故乡,但在各自的眼里看,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不相同。行走在异乡的路上,故乡却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抵达的远方。无论我们走多远,心都会落到那片植根的土地上。